



清华国学丛书

自由与传统

刘 东 著

Liberty and Tradition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清华国学丛书

自由与传统

Liberty and Tradition

刘 东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由与传统/刘东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5. 9

(清华国学丛书)

ISBN 978-7-301-26245-0

I. ①自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比较文化—研究—中国、西方国家

IV. ①G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05038号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书 名 | 自由与传统 |
| 著作责任者 | 刘 东 著 |
| 责任编辑 | 田 炜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301-26245-0 |
| 出版发行 | 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电子信箱 | pkuswsz@126.com |
| 电 话 |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577 |
| 印 刷 者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者 | 新华书店 |
| | 880毫米×1230毫米 A5 15.125印张 351千字 |
| |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56.00元 |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,电话:010-62756370

“清华国学丛书”总序

在现代中国,“国学研究”就其内容而言即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。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,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。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,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、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,更全面、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,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,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恢复建立,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,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,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,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。

在清华的历史上,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,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,后因各种原因,在1929年停办。在短短的四年当中,毕业学生近七十名,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近五十人。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四位先生,后被称为四大导师,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,其教育人才的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。

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,吴宓在《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》中明确地指出:“惟兹所谓国学者,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。而研究之道,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,并取材于欧

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,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。”近代以来,“国学”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,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。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,清华国学研究院对“国学”和国学研究的理解,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、教育的概念,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,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。在研究方法上,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。这表明,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,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,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,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,而是通向新的、近代的、世界性的学术发展。

所以,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,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。事实上,在20世纪20年代,在大学里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,清华并不是第一家,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(1922)、东南大学国学院(1924),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(1926)、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(1928),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,人员多,在当时影响广泛,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,声望和成就超出其他国学院所,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。究其原因,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,主要有二: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,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,沉潜坚定,不受激进主义的文化观念所影响;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、东方学的研究连成一体,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,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,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。

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,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

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。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院,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,我们也将以“中国主体、世界眼光”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。“国学研究”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,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;但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,不是闭关自守、自说自话,而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。

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力图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,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,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,力求把“清华国学研究院”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,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。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的多学科条件,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,内外沟通、交叉并进,既关注传统学术的总体与特色,又着重围绕中国哲学、中国史学、中国美学与文学、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,以高端成果、高端讲座、高端刊物、高端丛书为特色,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。

“清华国学丛书”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几种高端丛书之一,丛书主要收入本院教授、访问学人的研究成果,及本院策划立项的研究项目成果。这些成果在完成之后,经过遴选而收入本丛书,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

2011年1月

序 言

任何一次写作,都意味着充满快意的探险,而任何一次交稿,也都意味着战战兢兢的考试。——在这个意义上,如果自己行将杀青、几乎要同时交出的《跨越与回归》一书,是在考验自己研究的深度,那么,这本结集而成的《自由与传统》,则是在考验自己思虑的广度。

只要打开本书目录就可以发现,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集。——由于最近的写作比较密集,所以这里排出的全部八个纲目,包括“比较”“西学”“编译”“国学”“汉学”“日本”“文学”和“当代”,就像心电图的截面一样,摊开了自己晚近思想的主要视域。——所以说,尽管这还不是全部的关注点,但至少这些纲目还能够标明,自己确实还是在严守着古训,而“声声入耳”和“事事关心”的。

不过,由此也就带来了相应的风险。比如,尽管已经在尽量地进行编排,甚至在每个纲目之下,都只严格限定了三篇文章,可它们也许仍然会显得零散,而不会像一本“专著”那么集中。——至少也可以这么说,当今学术界的同侪们,都会显得更加职业化,既不惯于自己去这样浏览,也不惯于这样去阅读别人。

只是这却也无法可想。本来么,如果从阅读的心理而言,原就应该是无所不读的,而且越是新鲜和未知的,也就会有越多的兴味。所以就不妨实话实说,这里还并不是自己的全部思绪,甚至,还没包括

自己这段时间下力最多的美学、艺术社会学,以及比较哲学、中国现代思想史等等。——在那些方面的相关研究,我也会很快就交付出版的,比如除了前边提到的《跨越与回归》,还有已经成型的《天边有一块乌云:儒学、杨朱与存在主义》,和接近成型的《从文化看美学:纯粹感性批判》等。

也许遗憾的是,只要是按年来结集的书册,总是无法做到过于集中,因为它们不是沿着纵向,去展示思想所发出的枝蔓,而是转而沿着横向,来展示生命所扩张的年轮。——对于这种特定的图书特点,我在《理论与心智》的新版后记中,已经指出过一次了:“这看上去,或会显得有些‘零散’。不过,我却要为此辩解几句。实际上,如果转念来看,又正因为你对‘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’,事事都忍不住要关切与操心,你的心智才能稍微表现得完整一些。”

更严重的是,像这个样子去“遇书无所不读”,还更会遭遇到额外的风险。无论如何,思想是一项相当艰苦的事业,所以所谓的“广博”本身,也并不是那么的“好玩”,反而更难帮自己藏起拙来,也更容易暴露自己的头脑还在什么转折处并没有打通,以致它的这个和那个“沟回”,还在相互抵牾而不能自治,——就像一个刚刚和起来的面团,乍看上去倒像整整一大块,然而其中还有些细小的部分,夹杂着没有浸湿与和匀的干面,所以等到读者下咽的时候,也还会显得有点疙疙瘩瘩。

正因为这样,尽管在一个方面,自己最近确实是写得较快,然而我并不喜欢类似“厚积薄发”那样的形容;毋宁说,沿着以往开出的很多思路,自己是很自然地走到了这里,并形成了现在的写作节奏。此外,在另一个方面,对于以往发出的议论,一旦眼下真正想定了,我也会对它明确地有所修正,而不会随意就糊弄过去,——比如在《另

一种爱情》一文中,对于以往那篇《爱情的圣经》,自己就已明确地有所损益。

毫无疑问,即使诚心诚意地这么做,这些思考到了读者乃至后人那里,还是会被挑拣出很多错误。不过,为了负起最起码的责任,自己毕竟还是要稳步地推进,即使这在别人看来不过是“走火入魔”;同时,自己也还是要竭诚地改进,即使这在别人看来是“误入歧途”。

无论如何,不断去回顾自己以往的思路,并拣出其中某些片段,来细细地反刍与回味,这至少可以算是向世界来证明,自己总是在“昨日之我”的基础上,再来张扬这个“今日之我”。所以,我的这个“自我”毕竟还是开敞着的,我的这个生命也总还是活泼延续着的。

刘 东

2015年2月8日于三亚湾·双台阁

目 录

“清华国学丛书”总序	1
序 言	1

一 比较

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	3
自由与传统的会通	26
价值传统的积极面	63

二 西学

什么是“阅读经验”?	69
伯林:跨文化的狐狸	82
发明传统:伪造还是再造?	131

三 编译

理论的祛魅与登堂	169
总体攻读与对话意识	182
理解的热情,或翻译与文化势能	190

四 国学

发散又聚敛地重读孔子	197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对于往事的中国记述	208
关于陈寅恪的思考提纲	224

五 汉学

“汉学”语词的若干界面	243
跨文化阅读的汉学资源	281
国学、汉学与中国学	284

六 日本

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	305
封闭的开放	323
日本的“小大之辨”	340

七 文学

伟大背后的伟大	357
另一种爱情	371
那就爱这个“错”吧	397

八 当代

沿着八十年代的心力所向	415
寻求“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”	443
仁心一刻也不能断根	456

代后记：为国家社稷而贪功	465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一 比较

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

自由与传统的会通

价值传统的积极面

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

一

我们都知道,孔子曾经对着“德之不修”和“学之不讲”的状况,表达出特别深切的忧虑。如果再参照他那个年代“礼崩乐坏”的现实,我们就不难由此体会出,对于学术话语的“讲说”或“讲谈”,至少从孔子的角度来看,对于文化传统的传习与发展来说,具有相当关键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。——这是因为,一旦这样的“讲说”或“讲谈”被冷落了下来,载有文化精义的经典就要被束之高阁了,而文化的内在运脉也便要渐渐式微了。

正因此,对于学术话语的这种持续“讲说”或“讲谈”,便应被视作支撑起一种文化传统的、须臾不可稍离的深层推力。更不要说,这种来自主体内倾的文化动力,对于由孔子所开出的这个文化类型而言,又具有远较其他文化更为重要的意义。这是因为,此种文化的特点恰在于“无宗教而有道德”;也就是说,它决定性地舍弃了在它看来并不可靠的、至少也是属于未知的外在神学支点,转而去向更有把握体会到的、来自主体的仁爱之心去寻求支撑。—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才曾这样来总结此种文化模式的独特贡献:“善于自我救度

的、充满主动精神的人类,实则只需要一套教化伦理、提升人格的学术话语,去激发和修养社会成员的善良天性,就完全可能保证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断,从而不仅维系住整个社会的纲常,而且保障人们去乐享自己的天年!”^①

我们知道,到了两千多年以后,为了维持这种话语本身的生机,以保持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的状态,现代学者冯友兰又在他的《新理学》一书中,把儒家后学对于它的“讲说”或“讲谈”活动,区分成了“照着讲”和“接着讲”两种。而沿着他的这种思路和句式,我跟着又把从“照着讲”到“接着讲”的关系,发展到了再从“接着讲”到“对着讲”的关系。——回顾起来,我当时正在北大比较所工作,也就是说,当时我正集中关注着文明边界上的问题。所以,按照自己当时的心念,如果能把上述两组辩证关系再串联起来,那么,借助于这三种接续产生的、针对全部既有人类智慧种子的,既严肃又灵动的讲说态度,就有可能牵出一条足以把我们引领出“诸神之争”的红线。

正是为了克服片面囿于某一传统的“接着讲”,我们就必须把它进一步解放为“对着讲”!事实上,每天都摆向我们案头的西方学术译著,和林立於我们四壁书架上的中国古代典籍,已经非常鲜明和直观地提示着我们,如今不管谁想要“接着讲”,也至少要承袭着两种精神传统去开讲,——而且是两种经常在相互解构和解毒的传统!由此很自然地,如果我们自信还并非只是在以西方传统或中国传统为业,而是在以思想本身为自己的事业,那么两种传统之间的“对着讲”,就无疑是一种更合理也

① 刘东:《意识重叠处,即是智慧生长处》,《思想的浮冰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4年,第62—63页。

更宽容的学术选择。^①

在那以后,我虽然又调到了清华国学院,工作的重心也随之有所调整,可自己在这方面的持续关注,却没有发生过丝毫的转移或变迁。毋宁说,我倒是发现了这种种从“照着讲”到“接着讲”再到“对着讲”的、越来越丰富和细腻的讲说方式,对于如何开展国学本身“讲说”或“讲谈”,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。——而为了能充分展开这种想法,我又需要在开头的这一节里,先来讲清在这三种“讲说”方式之间,究竟是如何渐次升华和不可分割的。

首先应当看到,学者们所以会一再地提出和细化这类区分,而先从“照着讲”走到了“接着讲”,又从“接着讲”走到了“对着讲”,当然是因为大家都在具体“讲说”的过程中,不断意识到列在后面的那种“讲说”方式的必要性。——比如说,即使只打算去“照着讲”,实际也不会只是在老实巴交地照本宣科,而必须充分调动起阐释者的积极性,否则就什么想象力都发挥不出来,什么新意和创见都“讲说”不出来,从而也就势必要被后人所忽略或淘汰了。正因为这样,正像伽达默尔早已向我们展示过的那样,在作为一种有机过程的“讲说”活动中,真正称得上卓有成效的“照着讲”,就只能是充满参与精神的“接着讲”,哪怕有人挑明了要严格地采用汉学(汉代之学)的方法。

进而言之,由于文化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交流,已使得任何统绪都无法单独自闭,又使得任何想要在哪条单线内进行的“接着讲”,都会不自觉和程度不一地变成了“对着讲”。——比如,如果只看其表

^① 刘东:《从接着讲到对着讲》,《道术与天下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239页。

面的宣示,唐代韩愈口中的“道统”曾是何等地森严和排他,所谓“斯吾所谓道也,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。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,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,孔子传之孟轲”^①。可在实际的文化操作中,等到这个“道统”在后世真被继承下来,获得了被称作宋代“道学”的精神后裔,却不仅没对佛老进行“人其人,火其书,庐其居”^②,反而被后者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

难道不是这样吗?如果没有印度文化的传入与接受,立论重心原在仁爱之心的儒家,顶多也只会以康德式的“主观的合目的性”,去虚拟地提出《易传》中的天地解释,以充当自家学说内核的、拉卡托斯意义上的“保护性假说”。而宋明理学的那些基本命题和图式,什么“格物/致知”,什么“主敬/主静”,什么“天理/人欲”,什么“道心/人心”,什么“天地之性/气质之性”,就不会照后来的样子被诱发出来。——尽管话说回来,又必须是沿着儒家学术的基本理路,和不失这种人生解决方案的基本特色,这类的诱发才会显出积极的效果;正因为这样,在先秦时代曾经看似平分秋色的“儒分为八”,也就不可能获得同样的思想史地位。

既然说到了这里,就不妨再跟着补充说明一句,人们以往在这方面,似乎未能以同等的注意力看到,理学家之所以能顺利汲取当时的“西学”(西域之学),则又是因为早在他们的时代之前,中原文化便已针对着外来的佛学话语,而长期采取了“对着讲”的文化策略,从而既逐渐化解了其外在性,又悄悄把它转化为可以优势互补的思想

① 韩愈:《原道》。

② 同上。